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魏若望 著 吴莉苇 译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

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J.
(1665-1741)

John W. Witek, S. J.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Via dei Penitenzieri 20

00193 ROMA

© John W. Witek, S. J. 1982

ISBN 88-7041-343-8

Tipografia Editrice M. Pisani-Isola del Liri, 1982

图书在版编目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7-5347-2629-8

I. 中... II. ①魏...②吴... III. 傅圣泽—传记
IV. B979.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063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

作 者 [美]魏若望

译 者 吴莉苇

责任编辑 沈 顿

责任校对 新红琴 李 靖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0371-63863551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41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

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

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出版说明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汉学若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多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献和档案的较少,翻译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这或许是该领域的研究总是进展缓慢、鲜有创造的一个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组织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从基本文献的翻译入手,分三个系列向国内读者介绍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本书系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目前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在继续致力于这一书系组织出版的同时,为配合国家的清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部分有关清代传教士著作和文献的译著,从这套书系转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编译丛刊”中出版,特此对读者诸君作一说明。

学术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纪大事,我辈能参与其中,为之尽心,足矣!

大象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04年6月

中文版作者序

魏若望

近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显著发展为关于晚明和前清的研究开辟了更新的视野。看到研究 17、18 世纪中西交往的中国学者也包括博士候选人的数量在增长,着实令人振奋。

将有关该领域的西文书籍与论文译为中文,大有裨益于这方面的学术交流。在语言转译方面存在不同学术意见这一点,在众多世纪以来已成不移之论,但这个问题不应阻止任何人去了解像傅圣泽这样一位曾于 1699 年至 1722 年居住中国的复杂人物。当前这个译自原始英文本的中译本含有涉及多种语言的手稿和刊印资料的大量注解与书目。中国读者应当明了,由于此书是 1982 年在罗马首次付印,所以后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出版的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著作已经为本书所讨论的某些主题补充了新的资料。

在此向这套译丛的主编张西平教授和本书的译者吴莉苇博士深表谢意,感谢他们为出版此书所做的不懈努力。

2003 年 8 月于华盛顿乔治敦大学

中文版序

张西平

傅圣泽 (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 清代法国入华传教士, “圣泽甫莅中国, 即传教福建, 然无所定所。1702 年诸道长遣之至江西之南昌、抚州。圣泽初至抚州, 仅有教民百人, 逾年其数倍增。考试年士子集州城, 多有访问圣泽者, 圣泽常集士子多人之为之讲说教义, 并以前辈教师所撰之书籍赠之”。^① 他在华的活动时间并不长, 1699 年来华, 1722 年返回欧洲, 在中国生活了约二十二年 (1699. 7—1722. 1——译者)。如果同那些在中国生活几十年, 最后又葬于中国的传教士相比, 他并不太突出。但在清代的入华传教士中, 他仍是一个很有特点、值得研究的人物。美国汉学家魏若望先生所著《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一书, 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傅圣泽研究最有影响的一本著作, 作者依据大量的原始文献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傅圣泽的丰富材料, 使傅圣泽这个和中国清代历史相关的人物形象渐渐清晰起来。如果把傅圣泽放在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 傅圣泽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是很有特点的。

第一, 傅圣泽曾被康熙帝招进官中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白晋是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 到北京后和张诚一起在官中为康熙服务, 深得康熙宠爱。白晋很早就开始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对其十分推

^①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页 556。

崇。1697年他返回法国,在巴黎做讲演时就说“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①六年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白晋已经写出了研究中国典籍的著作《天学本义》。^②在《天学本义》自序中他提到了《易经》,说:“秦始皇焚书,大易失传,天学尽失。”他的书的目的在于恢复天学,这本书的上卷是“择其小经文论上天奥妙之大要”,下卷是“择集士民论上天公俗之语”。^③如韩琰在给白晋《天学本义》所写的序中说的“此书荟萃经传,下及方言俗语,其旨一本于敬天”^④。此时,白晋研究的内容已经涉及到《易经》,但尚未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易经》的研究上。

目前所发现的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最早的文献曾记载傅圣泽的情况有:“四月初九日,李玉传旨与张常住:据白晋奏说,江西有一个西洋人,曾读过中国的书,可以帮得我。尔传于众西洋人,着带信去将此人叫。再白晋画图用汉字的地方,着王道化帮着他略理。遂得几张,连图着和素报上,带去。如白晋或要钦天监的人,或要那(应为“哪”——作者注)里的人,着王道化传给。”^⑤据学者考证,这份文献的时间应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⑥

① 转引自林金水:《〈易经〉传入西方考略》,载《文史》第29期,页367。

② 白晋的《天学本义》分别藏在:古兰《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日文书目》(Maurice Couran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areens, japonais, etc* (Paris 1912) Chinois 7160《天学本义》,7163《古今敬天鉴》(上卷),7161《古今敬天鉴》(下卷);余东:《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16至18世纪》(Yu Dong, *Catalogo Delle Ope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XVI - XVII sec* (Città Vaticano 1996) 25-1《天学本义》,参阅伯希和(Paul Pelliot)目录号的 Borg. Cinese. 316(14)《古今敬天鉴天学本义》。

③④ Borg. Cinese. 316(14)《天学本义》白晋自序、《天学本义》韩琰序。

⑤ Borg. Cinese. 439(b)。

⑥ 当时的江西巡抚郎廷极在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五的奏折中,提到将送江西的传教士傅圣泽进京。罗丽达对有关白晋读易的十份文献做了很好的研究,见其撰写的《白晋研究〈易经〉史事稽考》,(台湾)《汉学研究》,1997年第15卷第1期。

对进京一事傅圣泽曾上奏康熙帝云：“臣傅圣泽在江西聆听圣旨，命臣进京相助臣白晋同草《易经》稿。臣自愧浅陋，感激无尽。因前病甚弱，不能陆路起程，抚院钦旨即备船只，诸凡供应，如陆路速行于六月二十三日抵京。臣心即欲赶赴行宫，恭请皇上万安，奈受暑气，不能如愿，惟仰赖皇上洪福，望不日臣躯复旧，同臣白晋竭尽微力草《易经》稿数篇，候圣驾回京恭呈御览。”^①

康熙一直十分关心白傅二人的研究情况，多次问及此事。“初六日，奉旨问‘白晋所译《易经》如何了？’王道化回奏‘今现在解算法统宗之九摺九图，聚六图等，因具奏’。上御‘这几个月不曾讲《易经》，无有闲着，因查《律吕根原》，今将黄钟等《阴阳十二律》之尺寸积数，整音半音，三分损益之理。即如箫笛、琵琶、弦子等类，虽是顽（原文为“玩”）戏之小乐器，即损益之理也。查其根源，亦无不本于黄钟所出。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俱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己出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若不即其数之精微，以考查，则无所倚，何以为凭据。尔可对白晋说：‘必将古书细心校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所译之书，何时能玩？必当玩了才是。’”^②这是康熙对白晋《易经》研究的具体指导。

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要想读懂《易经》并非易事。白晋在给康熙的回奏中也道出了其苦衷。“初六日，奉旨问白晋‘尔所学《易经》如何了？钦此。’臣蒙旨问及，但臣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义。凡中国文章，理微深奥，难以洞彻，况《易经》又系中国书内更为深奥者，臣等来中国，因不通中国言语，学习汉字文义，欲知中国言语之意，今蒙皇上问及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倘圣恩不弃鄙陋，假年月，容臣白晋同傅圣泽细加考究，倘有所得，再呈御览，求圣恩教导，谨

① Borg. Chinese. 439(a)。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出版，1970，页280。

② Borg. Chinese. 439(a)，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页280—281。

此奏闻。”^①由此可见,康熙对白晋和傅圣泽的《易经》研究活动抓得很紧的,传教士们几乎跟不上康熙的要求和期望。

后来,傅圣泽与白晋在研究《易经》的认识上曾产生了分歧,梵蒂冈存的一份文献说明了这一点。“有旨问,臣白晋你的《易经》如何?臣叩首谨奏。臣先所备《易稿》粗疏浅陋,冒渎皇上御览,蒙圣心宏仁宽容,臣感激无极。臣固日久专于《易经》之数管见,若得其头绪尽列之于数图,若止臣一人愚见,如此未敢轻信。傅圣泽虽与臣所见同,然非我皇上天纵聪明,惟一实握大易正学之权,亲加考证,臣所得易数之头绪不敢当,以为皇上若不弃鄙陋,教训引导,宽假日期,则臣二人同专心预备,敬呈御览。”^②

后来傅圣泽在对《易经》的理解上和白晋的分歧加大。傅圣泽是白晋让康熙从江西调到北京来,同他一起研究《易经》的,但俩人在研究上对《易经》的理解不同。“当白晋将注意力集中在《易经》的算术和几何成就时,傅圣泽却因对其道教的兴趣而超越了这一点。”^③

在这本书中魏若望先生对傅圣泽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的过程做了介绍,以上我只是根据这几年来在梵蒂冈图书馆所查阅的有关文献加以补充。关于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白晋和傅圣泽研究《易经》的文献的作者归属,魏若望先生在本书中只是表达了一种意见,究竟如何,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在康熙身边研究数学和天文学。

傅圣泽在研究《易经》和白晋有了分歧后,康熙曾安排他做数学和天文的研究。他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给康熙的奏文中说:“臣傅圣泽系愚儒,不通中国文义,蒙我皇上洪恩,命臣纂修历法之根,去岁带至热河,躬亲教导,实开茅塞。《旧躔》已完,今岁若再随驾,必大获益,奈自去口外之后,病体愈弱,前病复发。其头晕头痛,

① Borg. Cinese. 439(a),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页280—281。

② Borg. Cinese. 439(a)。

③ Joan T.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p202, Roma 1982。

迷若不知，即无精力去。去岁犹有止时，今春更甚，几无宁息，不可以见风日。若再去口外，恐病体难堪，仰^①且误事。惟仰赖我皇上洪恩，留臣在京，静养病躯。臣尝试过，在京病发之时少，而且轻，离京则病发之时多，而且重，今求在京，望渐得愈，再尽微力，即速作历法之书，可以速完。草成《月离》，候驾回京，恭呈御览，再求皇上教导。谨此奏闻。”^②这说明傅圣泽协助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不过二年，以后就主要做数学和天文学研究了。当然，傅圣泽自己对《易经》的研究并未停止，他自己在这一段时间仍然写了不少研究《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论文。^③

康熙从刚即位时的汤若望和杨光先的历法之争开始，就对西方科学有了兴趣，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朕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相互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④在中国历史上像康熙这样热爱西方科学，用心学习西方科学的皇帝并不多见^⑤。康熙即位不久就请南怀仁为其讲授天文和数学，张诚、白晋等法国传教士来华后，他又把他们留在身边给他讲授几何学。康熙对数学的这种热情始终未减。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下令开蒙养斋并颁旨：“谕和硕诚亲王允祉等，修辑律吕算法诸书，著于蒙养斋立馆，并考定坛庙宫殿乐器。举人照海等四十五人，系学习算法之人。尔等再加考试，其学习优者，令其于修书处行走。”^⑥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和素给康熙的奏报中曾提到了傅圣

① 阎宗临和方豪先生的引文均少抄这个字，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页285。

② Borg. Cinese. 439 (a)，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页285。

③ 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quet, S. J. (1665—1741)*, pp. 164—207.

④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页86。

⑤ 白晋著、冯作民译：《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台湾光启出版社，1966；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⑥ 《清圣祖实录》卷256，康熙五十二年甲子。

泽：“西洋人吉利安、富生哲^①、杨秉义、杜德海将数表计算翻译后，起名数表问答，缮于前面，送来一本。据吉利安等曰：我等四人将此书尽力计算后，翻译完竣，亦不知对错。圣上指教夺定后，我等再陆续计算，翻译具奏，大约能编六七本。”^②这也表明傅圣泽是在康熙身边协助他研究数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在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康熙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③。阿尔朱巴尔中，传自东方之谓也。”^④这段话说明康熙把对数学的兴趣和中国的典籍《易经》结合了起来，表明了康熙的“西学中源说”思想。

“西学中源说”是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它对清初的思想和学术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谁最早提出了这一思想，对此学术界尚有争论。^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在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⑥

魏若望先生认为傅圣泽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在热河时献

① 即傅圣泽。

②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878。

③ 阿尔朱巴尔，即“代数学”(algebra)词的译音，亦称“阿尔热巴拉”、“阿尔热八拉”。见梅穀成《赤水遗珍》。其最初见于公元825年的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拉子摸(Mohammed ibn Musa ai-khowarizmi)所做的 *Al-jabr w' al muqabala* 一书，它是代数学之祖。“这本书在12世纪译成拉丁文时，书名为 *Ludus algebrae et almucgrabalaeque*，后来简称 algebra。参见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页226。

④ 蒋良琪：《东华录·康熙八九》。

⑤ 徐海松在《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中认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梅文鼎，王杨宗则认为最早提出的应是康熙，见王杨宗《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载《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四十年学术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⑥ 《康熙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十九“三角形推算论”。

给了康熙《阿尔热巴拉新法》。^① 这个判断需要进一步讨论。上面讲到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康熙已把“西学中源说”和《易经》联系起来,其依据就是“阿尔朱巴尔”。这个谈话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年二月。根据这个谈话和时间,可以做出两点判断:其一,康熙在此前已经了解并学习了西洋算法阿尔朱巴尔法;其二,一开始给康熙讲授这一算法的肯定不是傅圣泽,因为傅圣泽接旨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应是康熙五十年四月以后,即是在康熙和赵宏燮谈话之后。实际上早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诚、白晋、安多、巴多明、杜德美在给康熙讲授西方数学时已经讲授了阿尔热巴拉法。他们所译的西洋数学书中就有《借根方算法节要》,也就是代数学。^②

代数学源于东方,后传到西方,康熙说这是“东来之法”^③并不错,但正像一些学者所说,这个“东”的概念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实际上应是源于阿拉伯,而康熙很可能把它理解为源于中国,是不是“传教士为讨好康熙皇帝而故意编造的谎话呢”^④? 史无凭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以前,他就有了“西学中源”的想法,即《易经》为西洋算法之源的想法。也就是说康熙的这些想法在前,安排白晋研究《易经》在后,说明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时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因为“西学中源说”实际上是康熙对待西学的一种基本策略,是他在当时的中西文化冲突中所采取的一个

① 梵蒂冈图书馆 Borgia Cinese 319—4,其法文稿题为《代数纲要》(*Abregé d'algèbre*)。

② “九《借根方算法节要》上下二卷,共一册,有上述印记(即‘孔继涵印’,‘荭谷’及‘安乐堂藏书记’诸印)。按孔继涵藏本,尚有:十一《借根方算法》原书为三卷矣。其中十二《借根方算法》,八卷一种,又《节要》二卷,不著撰稿人姓氏,藏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见《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七卷《中算史论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69。“《数理精蕴》编修前曾有《借根算法节要》一书问世,此书可能是西洋人译后给康熙讲课用的。”见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第七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326。

③ 1712年康熙在教梅文鼎之孙梅穀成“借根算法”时曾说:“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之法。”载梅穀成著《赤水遗珍》。

④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

重要文化政策。^①

当傅圣泽再次向康熙传授西方的《阿尔热巴拉新法》时,“用天干开首的甲、乙、丙、丁等字表示已知数,用地支末后的申、酉、戌、亥等字表示未知数(和笛卡儿用 a、b、c、d 等字母表示已知数,用 x、y、z 等字母表示未知数相仿),又用八卦的阳爻一作加号,用阴爻——作减号,以 + 为等号”^②。康熙在学习时很可能联想起已经学习过的“借根算法”,很可能想到以《易经》为代表的符号系统,想起他已形成的“西学中源”思想。因此,在安排傅圣泽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以后,康熙又再次对阿尔热巴拉法感兴趣。

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

“启杜巴傅^③先生,知二月二十五日三王爷传旨,去年哨鹿报上发回来的阿尔热把拉书,在西洋人们处,所有的西洋字的阿尔热把拉书查明,一并速送三阿哥处,勿误。钦此。帖到可将报上发回来的阿尔热把拉书并三堂众位先生们,所有的西洋字的阿尔热把拉书查明,即送到武英殿来,莫误。二月二十三日,李国屏、和素。”^④

“字与杨、杜、纪、傅^⑤四位先生知,明日是发报的日子,有数表问答,无数表问答书,四位先生一早进来,有商议事,为此特字。六月二十五日,李国屏、和素。”^⑥

“字启:傅先生知尔等所作的阿尔热把拉,闻得已经完了,乞立刻送来以便平定明日封报,莫误。二月初四日,李国屏、和素。”^⑦

康熙对阿尔热巴拉法的兴趣,一方面和他对数学的兴趣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的“西学中源”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傅

① 吴伯娅:《康熙乾三帝与西学东渐》,页 431—435;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页 352—365。

② 梅荣照:《明清数学概论》,见《明清数学史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页 8—9。

③ 指杜德美、巴多明和傅圣泽。

④⑥⑦ Borg. Chinese. 439(a).

⑤ 指杨秉义、杜德美、纪理安和傅圣泽。

圣泽直接向康熙讲授阿尔热巴拉法，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康熙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事实。

第三，傅圣泽是入华传教士中索隐派的重要成员。“索隐派”虽然是指传教士在解释中国文化时的一个派别，但它的出现说明在“礼仪之争”以后，西方在面对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复杂心态。在“礼仪之争”中无论是“利玛窦路线派”，“反利玛窦路线派”，还是“索隐派”，每一种观点的提出都有其欧洲思想的背景，也就是说，看似针对中国的“礼仪之争”，在思想侧面上完全是一个欧洲思想史的问题。它昭示了在中国和西方相遇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对欧洲思想的影响，说明了我们在研究清代思想时应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关于这一点魏若望先生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我这里不再赘述。

很显然，魏先生的这本著作是在传教学的框架中来研究傅圣泽的，但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他的这种研究我们也是十分需要的。要研究好清代历史，入华传教士的研究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只有做好入华传教士的研究，我们才能对清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了解得更加清晰。正像戴逸先生所说：“清代历史和过去历史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世界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清代历史的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离开世界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难以解释清楚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情况。很多问题不联系世界，就看不清楚。”传教士就是清代的中国和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读完这本书，你一定会认同这个观点。

张西平

2004年8月31日写于北京枣林路游心书屋